

随心琐记

二娃爷爷的传奇故事

文/王瑞军



生活拼盘

苦菜

文/辛一

二娃爷爷其实并不神秘,也不带有什么传奇色彩,在我们这些熟知他的人心中已快要淡忘了。只是这次回老家听人们拉闲话,才觉得对于外人,二娃爷爷却是妇孺皆知,颇带几分传奇色彩。

二娃爷爷并不是我们王家人。人们所喜爱传诵的是得病以后的二娃爷爷。年轻时二娃爷爷并没人们传诵的那样伟大。年轻时的二娃爷爷英俊、威武,队里劳动一向积极主动。1959年作为村中劳动能手被派往重庆某机械厂当工人,当时两千多人的大队只要五个人,他就被选中了。一年之后,五人回来了,二娃爷爷也回来了,在不久后就得了脑瘤。听父亲说,二娃爷爷被脑瘤折磨得死去活来。二娃爷爷的发胖就伴随着脑瘤的疼痛而剧增。但尽管这样,也没耽误过窑上烧砖。直到胖得走路都很困难,瘤子也长到拳头般大小,二娃爷爷才做了手术。瘤子的大小我没有亲见,但我在童年曾有过三年的时间是和二娃爷爷共同度过的,我亲眼见过他的刀疤:从左前额呈弧形向后延伸,有一拃多长。二娃爷爷特别喜欢孩子,记得我就让二娃爷爷给剃过光头,我也吃过二娃爷爷那尺许大的手掌撮的莜面。二娃爷爷的发胖在手术后曾有过抑制,听父亲说,手术后的二娃爷爷还又在窑上发过两年威。那两年的劳动,知道的人都说,二娃爷爷像一头牛。不过,两年劳动后身体就开始发虚发胖,之后就一直住在他那个小屋。二娃爷爷终身未娶,也没有人给他提过亲。

父亲说,在那两年里,有一次他跟二娃爷爷出远门给队里办事,路上带着干炒面和干玉米面馍。走在一处常住的旅店过夜,店主睡后炕,老板娘睡炕头,父亲和二娃爷爷睡中间。晚上老板娘操着外地口音说笑道:“二娃哥,人家睡下一个嘟嘟儿,你一睡下黑个瞎瞎儿,想看看我们老汉也看不见。”二娃爷爷的传奇故事就始于发胖以后,也许就源于此间的劳动。

二娃爷爷从窑上回来后基本没离开过他那个小屋。起初他还能自己走动,后来他的身体又开始发胖,听说是另一种病。到死时,二娃爷爷的身体有三百多斤。人们对他的传诵就因为他的胖。三十里外的瓦窑村人们叫他加重二娃,其实不知底细的外村人都这么叫。发胖后的二娃爷爷二米多高,三尺来宽,穿一尺五的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二娃爷爷走十来步就坐下喘口气。人们对他的传说简直成了二娃爷爷和所有如我一样了解他的人的美好愿望了。其中一个非常优美的传说是这样的:二娃爷爷牵着一匹三岁小毛驴要过河。水有一米多深,毛驴怕水不过河。二娃爷爷就轻抚小毛驴的长耳朵,笑呵呵地对它说道,“你不敢过,让我夹上你过哇。”一回头,旁边还站着他爹,二娃爷爷把身子一蹲,“大,你也上来哇。”正要过河,听见一女子呼叫声,扭过身子,看看女子,然后大方地说道,“那把你也捎带上哇。”于是二娃爷爷左臂夹一只三岁小毛驴,右手抱一大姑娘,背上还爬着老父亲淌过了河。

我对传说这个词向来缺乏理解,我不知道传说有没有现实或理论根据,但我宁愿狠下心来假想它是真的。是的,二娃爷爷死时刚过四十岁,我想,活着的他要知道我的心思,肯定会伸出他的大手抚着我的脑袋,然后悄悄地跟我偷笑的。

都说“春华秋实”,老妈院子里的苦菜有些叛逆,在9月秋雨的滋养下,又冒出了新的一茬,嫩嫩的,软软的,不畏霜寒。

老妈院子里的苦菜分两种:一种是内蒙古农科院研发出的新品,红色,略苦;一种是老妈从农村大田里移植回的野株,绿色,微甜。

我怎么就不记得儿时的苦菜会甜?

可能还是几岁的时候吧,春天,跟随大人去梯田拔草,顺手挖回的满筐苦菜总是又苦又扎。

顽童只衷情于大地刚冒出的“酸不溜”嫩芽,先是顺着芽子冒出的方向深扒几下,再用双手扯住红白相间的部分,憋气一拽,一条白灵灵的“酸不溜”根就到手了,剥掉外皮咬一口,涌出的正是想了一整年的味道,脆生生又酸又甜。

“注意脚下的小苗哟……”一根尚未嚼完,空气里就飘来老妈的声音。

思念,犹如老妈院子里果树下的苦菜,

恣意生长,又无从释放。

这个国庆假期,又像往年一样过去了。

老家的同学又一次次打来电话或发来微信询问:“回么?”“再不回我们就老了。”

回首,那么多年,我觉得,我不曾年轻过。

孩子有一天问我:“如果用现在的所有换回18岁,你愿意么?”

我找不到答案。

我只知道,如果再拥有一次18岁,我可以是另一种活法。

可是在18岁时,我又是那么地盼望独立。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徐先生的发工资日,也是老妈的“发”日。

惦记着给老妈提现,张罗着买这买那,公鸡要现杀,羊肉要肥的,活鱼要大的,煤要精的,都是徐先生跑前跑后一一与摊主详细交流。

望着蹲在院子里挑拣着蔬菜的徐先生,我又想起了老爸的那句话:“女婿,摸来的也如意。”

都市心情

“敲”下欢喜

文/吴明松



在故乡,秋天的欢喜是“敲”下来的。

周末,一家人回到老屋。趁没有开饭,我带着孩子,一阵风似的上了后山,那里是我小时候的乐园。刚到半山腰,就见酸枣树像忠于职守的卫兵,把“脚跟”倔强地扎在并不肥沃的土壤中。

“快看,好多酸枣啊!”循声望去,一个个喜庆的“胖小子”红着脸,攀在枝头,咧嘴笑呢。我递过去一根竹竿,一双儿女就你争我夺地敲起了枝干。酸枣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枝头,落入大地母亲的怀抱。我捡起一颗尝了尝,酸甜适宜,清脆可口,仍旧是童年的味道。故乡的秋,对我这样的游子总是慷慨的。

刚装满一篮子,孩子们便“喜新厌旧”起来,他们呼喊着的,冲向了不远处的板栗园。枝头,圆鼓鼓的板栗穿着长满小刺的衣裳,像是披着坚不可摧的铠甲。孩子们急不可耐地举着长杆敲打着,栗子便“簌簌”地掉落下来。下山途中,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

论着该如何分配:这是给奶奶的,那是给外公的……充满稚气的声响,让这个秋天变得格外温情。

回到老房子,已近黄昏,金色的余晖抚摸着静默的山野和炊烟袅袅的村庄,勤快的母亲早已摘下藤架上的饭豆,和着香米一起蒸煮。另一侧的铁锅中,金黄色的板栗与醇香的鸡肉亲密缠绕,彼此成就,氤氲的香气勾起了大家腹中的“馋虫”。我夹上一颗饭豆细细咀嚼,粉嫩爽脆,清香诱人,妻子则热衷于板栗的香甜软糯,母亲却不怎么动筷,只是乐呵呵地看着。

第二天离家时,我的后备箱如母亲秋收的篮子,盛满了各种礼物。酸枣、豆荚、板栗、饭豆……它们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地凑在一起,像极了小时候围在灶台前、喧闹着等待母亲美食的儿女们。

那日,我们“敲”下了秋天的欢喜,带走了浓郁的乡情。